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九期 ——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08c)

---

【研究动态】在德国谈中国文革	茉 莉
【人物春秋】张春桥不写回忆录可惜	黄 钟
【研究报告】“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 (三)	何 蜀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 (之八)	刘文忠
【资料汇编】文革中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	欧阳龙门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研究动态】

### 在德国谈中国文革

• 茉 莉 •

当我们中国人经历那场疯狂而惨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

他们站在自由土地上，却用玫瑰色般的梦幻情调，崇拜邪恶的暴君毛泽东，并讴歌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不了解真相而造成天真的误读，在文革结束后真相暴露的三十多年间，欧洲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检讨，有的人甚至为此深感羞耻。因此，文革不但是一个需要中国人自己深入反思的大浩劫，对于欧洲人，这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

在文革过去三十年之际，德国之声和波恩中国学会于2005年5月27日，在莱茵博物馆共同举办了一场题为“文革——强制的遗忘”的研讨会。

◇ 安东尼奥尼的记录片《中国》

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主持了这场研讨会，应邀出席讨论的德国人有波恩大学汉学系

教授顾彬，波恩总汇报主编威斯特霍夫，中国人有德国之声自由记者史明和茉莉本人。在研讨会开始之前，莱茵博物馆放映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1972年，西方知名的左翼艺术家安东尼奥尼本着对红色中国的向往之情，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他的本意，是要向欧洲展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理想中国，但这位意大利人不肯放弃他的人文关怀，坚持他“以人为本”的拍摄方式，这样，他的影片中就出现了一些中共官方未曾安排的内容，例如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自发的集贸市场、破旧胡同、小脚老太太、……。这就惹恼了当时掌权的四人帮，他们认为安东尼奥尼蓄意“丑化中国形象”，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由此而起。此片在中国被禁三十多年。

尽管这个纪录片令中共当局如此恼怒，但在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看来，这个有点诗情画意的影片，美化了当时的现实，完全没有反映文革的巨大灾难性，没有展示出文革中政治迫害的残酷。

因此，主持讨论的冯海音先生说：“刚才我们看了电影，其中的理想主义非常令人振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百多万因文革丧生的死者，没有看到历史的创伤，所以我们应该展开讨论，以弥补影片的不足。”

孩童时代就在北京经历文革的记者史明，谈到他当年在中学参加了批判孔老二的小组，当时他们不给学生看安东尼奥尼的这个纪录片，却要求孩子们展开大批判。现在已届中年的史明说，对比文革真实的惨烈，安东尼奥尼影片中的文革太“宁静”了。

◇ 中国的年轻人是否追问父母？

研讨会主持人冯海音先生在会前曾和我交谈，他问：“1968年，我们德国的年轻人开始追问父母：你们在纳粹时代中做了什么？不知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有没有追问他们的父母：你们在文革中做了什么？”

今天，世人已经公认，毛泽东和希特勒都是20世纪最邪恶的暴君，而文革和纳粹时代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的浩劫。但不同的是，德国人在二战后做了深入的反省和忏悔，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那一代人的罪过，今天德国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国家，是与全体人民长期自我脱胎换骨的过程分不开的。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凭吊魏玛集中营时所说：“虽然历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德国最羞愧的历史一页中学得许多东西……这是德国的道义与政治责任。”

那么中国人是否也从文革那荒诞岁月里学到什么东西，承担起道义与责任呢？中国的年轻人是否了解文革？回答很不令人乐观。我在发言中谈到，对于文革这一践踏文明，毁灭文化，草菅百万人命，株连一亿民众，给国家经济造成八千亿元损失的十年痛史，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态度：掩盖，冷漠，回避、怀旧和拒绝遗忘。

首先是掌权者掩盖历史。因为文革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祸国殃民的罪恶史，作为毛泽东法统的继承者，中共官方从本能上就不愿意提起这段历史，他们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掩盖这段历史。其次，拜金主义导致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加上言论自由的钳制，所以人们对文革的罪恶持冷漠遗忘的态度。此外还出现了文革怀旧派，他们大唱文革老歌曲，重新刊登文革画，把文革时尚化。

因为文革的历史太沉重，所以有些中国人就把它浪漫化、轻松化，这中间当然也有不满现实而产生的怀旧的因素。我提到一个例子是，在中国，现在有人开“毛泽东饭店”、“毛泽东书店”而大赚其钱，而在欧洲，以希特勒为书店、饭店命名，是不能想象的。这说明毛泽东的欺骗性，也说明文革的罪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

但我们中国总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拒绝遗忘，而把反思文革当作知识分子的使命。三十年来，个人的民间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究生生不息，不绝如缕，例如海外著名学者宋永毅、王友琴等人所做的贡献。

#### ◇ 西方人对抢救文革历史的责任

那么，德国人是否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他们今天怎么看中国的文革？

波恩总汇报主编威斯特霍夫当年是一个崇毛的大学生，他的书柜里常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在研讨会上，威斯特霍夫说：“我念大学时代，人们投注极大的热情、在并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去关注中国的文革，其中包括从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了解中国，以美化了的、遮掩的形式。而现在了解了这么多真实情况之后仍然很少谈论这个问题，这简直就是一个丑闻。”

主持人冯海音因此提问：“对于文革这段历史，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顾彬教授回答说：“茉莉女士不是说，我们德国因为有了民主制度，才能对历史进行反省，那么中国的文革，也就等到他们有了民主了再说好了。我们波恩的一个犹太人纪念碑，不也等了50年才建立起来。”

我接着发言说：“我反对顾彬教授的意见！中国的民主看起来还很遥远，但对于文革的反省，我们却不能再等待。我们需要尽快地抢救这段历史，否则当年的当事人就不在了。”我谈到我的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未遂，现在她已经病重的情况。我还说：“文革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西方各国都有义务帮助抢救这段历史，你们应该支持中国民间独立的文革研究者的工作。”

我的发言获得了观众的满场掌声。我有点感动，德意志民族是号称“哲学民族”的，他们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告别了猖獗的民族主义，其优秀的人文主义传统得以彰显，因此，他们也支持中国人也反省文革的历史。

在德国兴起“中国热”之时，企业经济界只考虑如何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但有良知的德国媒体和学者成功地举办这次学术活动，唤起了德国公众对文革那一场侵犯人权的浩劫的关注。

#### □ 原载香港《动向》七月号

~~~~~

#### 【人物春秋】

张春桥不写回忆录可惜

• 黄 钟 •

#### ◇ 荒唐年代的缩影

张春桥去世了。终年88岁。

2005年5月10日，也就是距张春桥去世后的第19天，新华社发消息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

如今，当年大陆妇孺皆知的“四人帮”，只剩姚文元在世。1991年5月14日，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寓所用一条裙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78岁。6月4日，也就是去世后的第21天，新华社发了关于她的一条百字死讯。“四人帮”里最年轻的王洪文，花甲未满，就于1992年8月3日病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说，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张春桥，一个已被人们淡忘的人物，因为死亡，又重新激起了一些人的记忆，一些人的好奇。很快，他又会归于淡忘。他的88个春秋，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缩影。

#### ◇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张21岁投奔延安，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从此一步一步迈向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在政治的巅峰上，他跌落了，直到死时还是有罪之身。可他高寿——想必张并不是一个忧郁的老人，无论是否有人欣赏，他有他的个性。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一天，邓小平在写给华国锋的信里说：“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批发了罪证材料之二、之三。罪证材料下达后，大陆举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1978年12月，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基本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这一运动持续了二年时间。

在“四人帮”被抓9个月后的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这四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意味着，张春桥这位昔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政治生命先被判了死刑。而9个月前的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还是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1949年之后的大陆第一部刑法。1980年11月20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1月23日，根据刑法，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外，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在被抓四年零二个多月后，他们终于被判刑。北京举世闻名的秦城监狱，成了他们人生旅途不得不停留的一站。曾几何时，前北京市市长彭真、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前总参谋长黄克诚、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大师等中共高干以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都被关押在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这不只是表明那个时代大陆政治无常。

张春桥和江青一样，是在犯人的名分下走完了生命的旅程。1997年12月，张被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这就是说，如果不减刑或者特赦，要到2015年12月，张才能服满刑期。那一年，他将满98岁。88岁的张春桥，很可能是大陆病亡的年龄最大的“高干”犯人。

#### ◇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对于张的去世，有网友评论说：“活得可恶，死有余辜。”也有人说：“五十年后再评说”。当然，这话并不见得就是肯定张春桥，更可能只是说客观深入研究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政治和学术之间还有难解的纠葛。虽然在中国的先贤祠里永远都不会有张春桥的一席之地，但在大陆的情势下，对一个二十多年前虽未盖棺已被论定的政治人物来说，也许只有时间才是最冷静的裁判。

张春桥和他被指控为同伙的其他人一样，是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闹剧时代的闹剧人物。他们属于中国悲剧和闹剧的一部分。如果换一个环境，他们未必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类人物。美国建国二百多年不就没有像“四人帮”这样“篡党夺权”的“反党集团”或者“奸臣”么？邓小平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四人帮”。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首次公开把王、张、江、姚四人称为“四人帮”，并定性为“反党集团”。自此以后，对“四人帮”只有揭批，只有愤怒声讨。比如，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就称：“代表们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愤怒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完全赞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粉碎‘四人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赞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表示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后来决定对他们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1949年后，缺乏现代政党制度和政治竞争机制的大陆出现过不少“反党集团”。比如，“胡风反党集团”、“高饶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三家村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等等。而最著名的是刘少奇事件。1967年8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只能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向红卫兵抗议：“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1968年11月24日，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他得到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他才知道“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不过，自1976年之后，再也没有在中共内部出现官方定性的“反党集团”。可以说，“四人帮”是上个世纪中共定性的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也是迄今为止中共定性的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到目前为止，1949年后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反党集团”中，除了“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之外，均已经被平反。

从法治意义上来说，“四人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因为1997年修订后颁布的《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采用“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提法。刑法任何一条都没有“反革命”或者“反党”之类的字眼。“反党集团”或者“反革命集团”在法律上已经成为一

个历史名词。这是一个进步。同时也预示着未来中国的政治竞争不但需要而且将会进入法治、民主、人性的良性轨道。

◇ 张春桥不写回忆录可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到死都是一个法律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按照大陆刑法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就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如此规定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也算得上是稀有。这意味着，许多重要的人物，由于政治被打入另类，他们就难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留下他们的一家之言。起码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盲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里，昔日南部邦联的一些大人物们，就用回忆录和文章继续着往日的战斗，美国也没有剥夺罪犯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的法律，可美国并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据说，张春桥就未能留下任何回忆录。而张曾是中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笔杆子，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他15岁就在《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上发表《春雨之夜》。虽然张春桥后来曾写过不少的作品，但他一炮打响的文章却是《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该文发表在1958年9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六期上，10月13日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在文章里，张极力为供给制辩护，抨击“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些什么？”

毛泽东为这篇文章加的按语说：“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此后，张春桥官运亨通。1975年1月，张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1975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另一篇著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该文声称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鼓吹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许，今天再读张春桥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恍如隔世或充满厌恶。

可是，张春桥晚年三缄其口，甚至也不写回忆录，对于大陆来说，是一种可惜，是一个遗憾。其实，观点和立场，并不是关键。只要留下历史的真实记录，就有可能促进一个民族进行深刻的反思。就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死者已逝，来者可追。

□ 原载《凤凰周刊》

~~~~~

【研究报告】

“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三）

• 何 蜀 •

## ◇ 两大派在全面内战中的重组和演变

1967年7月中旬，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在重庆视察时提议：砸派这个名字不好，既然该派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可以叫反到底派。从此，砸派以反到底派之名出现。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与八一五派春雷造反兵团使用棍棒、钢钎、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增援，揭开了重庆造反派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7月25日，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强攻反到底派占据的化龙桥公路旁制高点重庆市工业学校，与该校反到底派红岩兵团展开大规模武斗，并动用了枪支。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得知工业校被攻占后，经过激烈讨论，以一票反对作出了向下属成员发放军工厂成品枪支的决定，八一五派则纷纷抢夺各地武装部枪支……从此重庆两派武斗进入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迁入和建立了一批兵工厂，在“文革”前开始的“三线建设”中，又经中央批准开始建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到1967年底，除个别项目外，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第一批项目基本建成。”（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303页）在“文革”武斗中，重庆这个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全面内战的武器弹药库。这是重庆武斗规模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67年夏秋和1968年春夏的两次大规模武斗中，重庆的群众组织增加了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两大派都各自组成了一些更大规模的，按工、农、学等界别划分的全市性大组织。二是两大派都建立了一些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

在两大派大规模武斗的1967年夏秋之际，各自陆续成立的更大规模的全市性大组织有：

反到底派——

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967年6月21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军工井冈山总部负责人）、夏祥贵（二轻兵团负责人）、黄廉（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汪有根（供电公司修试场蓄电池班班长，供电总部负责人，中共党员）、李贵全（天府煤矿技术员，四川煤矿系统造反总部负责人）、甘廷荣（财贸井冈山总部负责人）、胡宾（中梁山轮胎厂工人，化工总部负责人）、刘祖国（江北造船厂工人，二七战斗团负责人）等；

重庆市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简称农总司），主要负责人有罗昭容（南桐青年公社农民，中共党员）、蒋良知（北碚蔡家公社兴禾抽水站技术员，退伍军人）、吴国民（江北寸滩公社农民）、彭华清等；

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简称红大司），主要负责人王兴国（重庆交通学院学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负责人，共青团员），黄开华（重庆医学院医疗系学生，重医兵团负责人）等；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简称红中司）：主要负责人萧星明（第三中学学生，三中井冈山负责人）、翟秋生（工业学校学生，工业校红岩兵团负责人）、雷忠伍（重庆电力学校学生，电校东方红负责人）、陈反修（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学生，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负责人）

等；

重庆机关反到底司令部（简称机关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段炳森（重庆市体委举重运动员，体委井冈山负责人）；栗远奎（市民政局干部，中共党员）、韦明远（市中区监委干部，中共党员）、刘开科（市建委干部，中共党员）；

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主要负责人王以时（重庆市群众艺术馆美术干部，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队负责人），李天鑫（重庆市歌舞剧团演员）。

八一五派——

重庆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工总部），主要负责人阳增泰（八一兵团负责人）、陈万明（重庆九八战斗团负责人），袁金梁（二钢厂工人，中共党员）等；

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农联会），主要负责人赵行贵（巴县一品公社农民，红农八一五负责人），艾启贵（革命农民造反军负责人）；

红卫兵重庆警备区（简称红警区）；主要负责人周家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重庆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机关总部），主要负责人段德昌（重庆市经委干部，中共党员）等等。

但是，这些按工、农、学等界别划分的全市性大组织，往往只是个空架子，只能起到一些名义上的号召、宣传作用。它们与各系统、各部门其他组织之间并无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一些老资格组织（特别是较有名气的组织）仍然是各行其是，自成体系，另立中心。所以，当时由一些大组织代表签字达成的“停火协议”之类，往往是一纸空文，不起作用。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新出现了一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

4月20日，鉴于“砸烂革联会”呼声日高，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八一五战斗团成立“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所谓“捍卫红色政权”即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革联会），此后各地八一五派陆续建立起主要用于指挥武斗的“捍红指挥部”。

5月下旬，因“红五条”未承认革联会并决定另建革筹组，革联会不便继续存在，各区县革联会纷纷更名为“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或联合总部）”（简称捍红指挥部或捍红总部），后成为八一五派指挥武斗的专门机构。当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口号的消息传出后，八一五派又建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阳增泰（八一兵团负责人），副总指挥杨大渝（工人造反军二分团负责人，公交公司汽车修理总厂工人）。

在西南师范学院“六五——六八”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后，6月10日，重大八一五建立了“卫戍司令部”，随即建立了专业武斗组织三〇一野战队（专事校外武斗），主要负责人梁文福（重大冶金系六六级学生）；三〇二部队（专事校内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则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主要负责人邱开全（北碚歇马乡农民，复员军人，中共党员）、王树良（重庆棉纺织五厂工人，重纺五厂八二七负责人，复员军人）、林铭荣（北碚航管站工人，复员军人）；南岸区的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主要负责人邓长春（军工井冈山负责人）；还有二轻兵团的雄狮战斗团，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的红一连、红二连，军工井冈山的“舰队”等。



当“文化革命”演变成“武化革命”之后，群众组织也随之发生了再一次演变。一些原来不大知名的组织在武斗中因敢打敢拼而名声大振，另一些原来颇有名气的组织在武斗中被打垮或遭受重创而名存实亡，有的则在迷惘中沉寂下去。更有的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

如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他们力图使自己站在武斗之外。为宣传其反对武斗的观点，造反军司令部主办了《战恶风》报，在该报第二期（1967年9月6日出版）上，就发表了该司令部于武斗炮火正炽的8月27日呼吁两大派迅速停止武斗，组织力量下乡抢收、抢种的紧急呼吁和要求其下属组织下乡支援农业“双抢”的《特急命令》，并公开表明了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怕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不怕被说成是“右”了、“修”了；反对“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唯观点论”等见解，并在一篇小品文中称武斗中身亡的人不是“烈士”而是“冤士”……

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次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即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转发了《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强调了不能用“五十天”（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包庇“十七年”和“三十年代”（执行过“文艺黑线”）的问题。重庆文艺界两大派中的一些人员，在对武斗和相互攻击打派仗都感到厌恶之后，想走一条“中间路线”。他们在江青这个讲话的启发下，组织了一个“冲黑派”，公开宣称自己既不是八一五派，也不是反到底派，而是专门批判、冲击“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冲黑派”。当有人指责他们走“第三条道路”时，他们辩称：第三国际、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都是“第三”，“第三”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印发传单，写大字报，在闹市区组织设立了大批判专栏，力图引导更多的人来“掌握斗争大方向”，但是他们没有建立起组织，响应者寥寥，只活动了不长的时间。

到这一阶段，群众组织中“文革”初期的“革”与“保”，“造反”与“保守”的区分，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原“保守派”组织的一些成员，或出于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或出于寻求政治上的庇护，或出于个人恩怨，或随大流……分别加入了造反派的两大派中。因此，指责八一五派是“新老保”也好，指责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是“工纠变种”也好，都是毫无意义的。

发生在1967年秋末的一次突发事件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0月27日，反到底派六大总部负责人李木森、黄廉、王以时等应邀到歌乐山林园解放军总字412部队（通信兵工程学院），为该学院反到底派红旗造反团举办的中层干部学习班作“形势报告”，当晚在反到底派财贸井冈山宣传队“拥军爱民”演出中，该学院八一五派红色造反团及附近中学八一五派学生扰乱会场，发生武斗。八一五派为抓获已被解放军驻该学院勤务连（警卫连）接到驻地保护起来的反到底派负责人，冲击勤务连驻地并打人、夺枪。此时正值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不久，勤务连执行“九五命令”，在劝阻、警告无效时，“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开枪拦阻，造成伤亡。整个事件中死32人，重伤53人。造成震惊一时的惨案。

这个事件的发生十分意外。“文革”中，按中央军委指示，各地驻军管辖当地军队院校警卫部队，因此总字412部队勤务连属五十四军管辖，在一般群众心目中即为五十四军下属成员。在武斗期间，重庆驻军是倾向八一五派的，并与反到底派发生过多冲突。然而这次却是军队向八一五派学生开了枪，而且打死人数之多是整个重庆武斗期间罕见的。这不能不令重庆驻军难堪而恼怒。

常被人们忽略的是，发生冲突的该学院两派组织。八一五派的红色造反团，是早期的造反

派组织（与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即“冲派”属同一观点），而反到底派的红旗造反团，则有较多成员原属“保守派”（与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属同一观点）。因为历史的原因，学院领导及较多的中层干部站到了红旗造反团一边，形成反到底派将要控制学院大权之势；也因此，红旗造反团与驻学院勤务连关系好，而“老造反”的红色造反团则与勤务连关系长期紧张（勤务连的枪支就有一半被红色造反团夺走，“九五命令”后也未归还，只是自行“封存”）。此外，在北京“五一三”事件之后，首都三军的两派群众组织地位发生戏剧性的颠倒，三军革命造反派从“中央文革铁拳头”变成被中央文革抛弃的“打砸抢派”甚至“反革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则从“老保组织”一跃而成为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承认和支持的控制首都局势的革命左派，这也使重庆412部队的两派受到影响，反到底派的红旗造反团扬眉吐气，而八一五派的红色造反团则日益感到与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同样命运的威胁……

这个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当时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性质，已经不能再以“文革”初期那样的“革”与“保”、“造反”与“保守”的概念来简单区分了。

#### ◇ 两大派全面内战中的报纸、广播

在1967年5月“红五条”下达前后，重庆各群众组织创办小报又一度出现了高潮。这一阶段的小报，已经不再局限于由某个群众组织主办，而出现了不少由几个群众组织合办甚至不以群众组织名义而只以代表某派观点的某“编辑部”主办的情况，如

由反到底派解放军后字242部队红色造反者总团、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九一纵队、国家科委情报所重庆分所红色革命造反团、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重钢工人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尖刀分团、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等七个组织合办的《山城红旗》报（1967年4月30日创刊，后改为反到底工总司主办）；

反到底派重庆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重庆医学院重医兵团合办的《东方欲晓》报；

反到底派小人物编辑部主办的《小人物》报；

反到底派红岩红旗编辑部主办的《红岩红旗》报；

反到底派山城红日编辑部主办的《山城红日》报；

反到底派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总部、东方红11·16战斗兵团、重庆市中区税务局红色警卫队合办的《红满天》报（1967年11月4日创刊）；

反到底派三十六中毛泽东主义兵团、工总司交通总部省船井冈山合办的《红旗漫卷》报（1967年11月28日创刊）；

八一五派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合办的《星火燎原》报；

八一五派红卫兵重庆警备区机械校六二五、交院工程兵、二师八二九、九中八一五合办的《江南烽火》报；

八一五派重庆杨家坪地区支革联合指挥部主办的《风雷激战报》；

八一五派横扫编辑部主办的《横扫》报；

重庆八一五404部队横眉编辑部主办的《横眉》报；

重庆八一五6568部队冷对编辑部主办的《冷对》报……

此外，在武斗中，各派还经常出版一些对某次武斗事件进行专题“控诉”的专刊。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时期，因受武斗影响，纸张供应紧张，重庆市革筹组的“机关报”《新重庆报》被迫从1967年7月2日起改为每日出半张（两版），并从8月5日起减少发行数量，只在本市地区供应部分零售报，订户一律暂停发送（直至9月底才重新开始收订）。在这样的形势下，群众组织的小报也不得不停办或削减数量，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由几家小报合办的“联

合版”，如：

1968年2月7日出版的《山城战报》（八一五派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办）、《815战报》（重大八一五主办）、《八一战报》（八一兵团主办）、《山城红卫兵》（红卫兵重庆警备区主办）、《星火燎原》（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星火燎原纵队主办）、《机关战报》（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主办）的联合版；

1968年8月出版的反到底派《文攻报》（文攻报编辑部主办）、《机关反到底》（机关司令部主办）、《山城红旗》（山城红旗编辑部主办）的联合版……

当时重庆群众组织的小报，影响远远超出本市范围，而且“上达天听”。在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时的讲话中，特地谈到了四川、重庆的小报，周恩来谈到重庆情况时说：“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江青讲话中谈到四川红成、八一五派的小报大量攻击省革筹成员刘结挺、张西挺时也说：“你们四川出了那么多的大报纸，革筹小组是中央批准的，而且是经过了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你们就让人家那样搞。刘、张和我没亲，攀不上。那么大的报，你们不管，主席连小报都看。三个简玉霞，是主席在小报上看的。”“四川大报很多，人家占领了舆论阵地……”

毛泽东提到的那篇《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是八一五派《山城战报》第38期、《815战报》第47期联合版（1967年12月1日出版）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执笔人为重庆大学电机系六六级学生周孜仁（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成员）。当时重庆反到底派的小报中，也有一篇影响很大、被五十四军斥为“大毒草”的文章，是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山》报第4期（1967年7月13日出版）发表的长篇专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执笔人为四川外语学院教师林亚光（反到底派井冈山红卫兵成员）。

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全面内战期间还充分利用了广播进行“文攻”。影响最大的是设于市中心解放碑周围的几个广播站，如设于民族路餐厅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广播站，先后设于交电公司大楼和人民商店（原友谊商店）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设于工农兵市场（原群林市场）的八一五派痛打落水狗广播站，设于红旗糖果商店（原大众糖果商店）的八一五派红旗广播站等。其中尤以反到底派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影响最大。为此，在1967年全面内战高潮中的8月11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设于交电大楼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13日深夜大楼被燃烧弹击中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一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此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转设于解放碑另一侧的人民商店。12月15日，因有八一五派群众举报“反到底在太阳沟（菜市场）持枪抢白菜”，重庆驻军派部队包围了设于人民商店的财贸井冈山总部及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要求入内搜查枪支。反到底派则认为这是驻军“支一派压一派”的表现，提出条件，要求部队若执意搜查，在搜查不到枪支时必须向全市人民作检查，否则就拒绝部队搜查。双方形成对峙。部队包围至次年1月底（春前夕）才撤走。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每天在商店楼上窗口挂出大幅标语“非法武装包围××天”（日期逐日更换），墙上还挂满各地支持反到底派的群众组织送来的声援标语、布幅、大字报，引来大批群众围观，甚至有群众给被围困的反到底派人员送茶送饭送鸡汤。成为重庆城内武斗期间一大奇特“文斗”景观。

全面内战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广播，随着武斗的升级，都出现了庸俗化、流氓化的倾向。报纸上和广播中不断出现以造谣诬蔑来丑化对方的宣传，有的甚至堕落成了“黄色新闻”、“色情文学”（如直露地描写某一派的“女战士”如何遭到另一派或本派的“匪徒”强奸，甚至从“女战士”的第一人称角度进行渲染、描绘）。广播也从最初义正辞严的照着

稿子朗读变成后来随意发挥、油腔滑调的挖苦调侃、谩骂攻击……

#### ◇ “文革”群众组织的末路

1968年1月1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中央向全国推荐，全国掀起“围剿派性”高潮。在这种形势下，从反到底派中分化出少数人成立了一个“造联站”（反到底革命派造反联络站），宣称自己要重新和八一五派战友团结在一起，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并且明确指出这个“黑手”就是省革筹里的某些人——亦即八一五派一直要打倒的省革筹副组长刘结挺和组员张西挺。

然而，还没等到八一五派高兴多久，3月15日，正在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省集训两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的四川及重庆军政领导干部，却对重庆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红成派“打刘张”（即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宣布“打刘张就是为李井泉翻案”，“打刘张就是刘、邓复辟”（时称“三一五指示”）。这一下，不但八一五派不得不赶紧认错，而且又从八一五派中分化出少数人成立了一个“忠联站”（忠于毛主席联络站），宣称要与反到底战友团结在一起……

反到底派也没高兴多久。一个多月后的4月27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及重庆军政领导干部，又对重庆的反到底派和成都的兵团、八二六派“打谢（家祥）反梁（兴初）”，把矛头指向五十四军的问题，进行了严厉指责（时称“四二七指示”）……

“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两大派“各打五十大板”，两大派各自都有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作为精神支柱（只是成都红成派因得不到驻军支持而难以像重庆八一五派那样为“四二七”扬眉吐气）。在这样的形势下，不管是“造联站”还是“忠联站”，不管是哪一派，不管有多么响亮的革命口号，都已经不能再像“文革”前期那样激发起广大群众热情参与了。“文革”的反复折腾已经教育了广大群众，他们本能地认识到这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种“大革命”，他们看到了太多的丑恶，太多的不幸，太多的出尔反尔、翻云覆雨，太多的“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太多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此，这时的群众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拥有广大群众的群众组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失去群众。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反映出群众组织已经产生的另一种质的演变。

在中央学习班集训两大派负责人期间，在重庆的八一五派一批武斗人员得知反到底派西师八三一负责人周荣从北京学习班私跑回渝，住宿于重庆市杂技团楼上的反到底派炮声隆广播站，便纠集人员进攻该广播站，欲抓获周荣，两派展开武斗，动用了枪枝、手榴弹，死1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事件中，反到底派武斗人员竟得到了与之有“兄弟伙”关系的另一批八一五派武斗人员的武器支援。在此前后，一些曾一度你死我活厮杀的两派武斗人员已经厌弃“文革”政治原则，相互间结成了不讲派性只讲“江湖义气”和个人利害关系的“兄弟伙”。以后个别“兄弟伙”发展成了刑事犯罪团伙。

“文革”群众组织至此实际上已经走到了末路。

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仍作了最后一次“困兽之斗”——于1968年4月至7月展开了又一次血火厮杀的大规模武斗。这次武斗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了争夺地盘，争夺对一些基层单位的控制权，为建立自己一派独掌大权或基本控制大权的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武斗初期的“路线之争”，到这时已经基本上蜕变为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因1967年“九五命令”之后反到底派从国防工厂取用的现代化常规武器已经全部上交五十四

军封存，而八一五派又得到驻军支持，这一阶段的武斗，基本上是八一五胜，反到底败。反到底派人员大批逃亡他乡。

就在这次武斗的炮火硝烟中，1968年6月2日，所谓“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自称的“大好形势”中成立（对这一“大好形势”形成强烈讽刺的是成立大会上就发生了二轻兵团成员抬尸冲击主席台事件），两派代表各数十人进入革委会担任了委员职务，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两派代表有：黄廉（反到底工总司）、袁金梁（八一五工总部）、李木森（反到底工总司）、熊代富（重大八一五）；担任市革委会常委的有：方文正（八一五八一兵团），汪有根（反到底工总司），蒋良智（反到底农总司），韩荣华（财贸八一五），赵行贵（八一五农联会），徐光明（反到底井冈山红卫兵），雷中伍（反到底红中司），段德昌（八一五机关总部）。在此前（5月31日）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也有一批重庆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以“对等”原则进入，在省革委中担任常委职务的有：邓长春（反到底工总司）、陈万明（八一五工总部）、王兴国（反到底红大司）、周家喻（八一五红警区）。

#### ◇ 重庆与成都群众组织的比较

重庆在“文革”时虽然已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但却只是四川省的省辖市，而四川省的省会是成都。在“文革”中，成都与重庆的群众组织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和联系。“无产阶级司令部”在1968年春作出的“三一五”、“四二七”两个重要指示，都是同时针对成都和重庆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谈到重庆的群众组织，就有必要与成都的群众组织作一简略的比较。

在“文革”初期，重庆与成都都有“官办保守派组织”，重庆有“保皇四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文艺革命军、工人纠察队（工人战斗军）；成都则有“三军一旗”——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刀具厂八路军、成电（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两地略有不同的是，重庆没有贫下中农战斗军那样的全市性农民“保守派”组织，成都则没有文艺革命军那样的全市性文艺界“保守派”组织。

重庆的“保守派”组织在1966年12月4日的“一二·四”事件后遭到重创，到1967年1月就已基本上溃散，因为得不到五十四军的支持，所以再也未能恢复。成都的“保守派”组织虽也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重庆“一二·四”事件次日，成都发生“一二·五”事件，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设于红照壁礼堂的总部被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造反派抄砸），但却在1967年2、3月“镇反”中有幸得到成都军区的支持而一度恢复发展，直到当年5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下达后，还经过一番拼搏，才被迫解体。

在造反派组织方面，重庆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相似于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二者成立时间略有早晚不同：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最初名为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于1966年9月23日，红卫兵成都部队成立于同年10月11日。

学生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别，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在本地“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略相似于成都的四川大学东方红二六战斗团，只是他们从各自所在的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中分化出来的时间略有早晚不同：川大八二六从1966年11月13日的批判李井泉大会开始与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公开决裂，于1967年1月15日正式退出红卫兵成都部队，西师八三一则从1966年底开始批判重大八一五的“右倾”，在1967年1月4日的“纪念一二·四事件一周月”大会和1月下旬的全市夺权中与重大八一五等公开决裂。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对本地区的影响上，重大八一五在自己一派中的声望远远压倒了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而且形成了一个“八一五派”（在早期甚至重庆全市造反派都叫八

一五派)，而红卫兵成都部队中则没有哪一所学校的群众组织单独具有这样大的影响。相反，川大八二六在成都地区激进派别中的影响又显然比西师八三一在重庆的影响更大，川大八二六形成了包括“大八二六”（大学生）、“中八二六”（中学生）以及同一观点的其他组织在内的“八二六派”，而西师八三一则始终有交院九一五与之共命运，从未形成过以八三一命名的派别。

在工人造反派组织方面，重庆的工人造反军略相似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二者都是全市性的、跨行业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在1967年2、3月“镇反”中遭到打击（被打击的人员社会地位也很相似：重庆工人造反军首先被镇压的是其下属临江门街道的前哨支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首先被镇压的是其下属的街道工业分团）。不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始终是一个全市性的影响较大的组织，下属分团一般按行业、按系统划分；而重庆的工人造反军则从一开始就分裂为几个互不买账的山头（司令部、总部、一支队、二分团等），司令部的下属组织大多按产业系统组建，而总部的下属组织则比较混杂，当另一些按行业建立的组织在本系统影响较大后，造反军总部的一些下属成员陆续“归口”，以致反到底工总司成立后，造反军总部几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和几个“光杆司令”。而造反军二分团又是八一五派；造反军司令部在武斗开始后则走了“第三条道路”……因此，四分五裂的重庆工人造反军从未形成一个“造反军派”，其大部只能汇入反到底派，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则始终与川大八二六一起形成一个“兵团、八二六派”。

在军事院校群众组织方面，重庆的后字242部队（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相似于成都的空字028部队（第十三航空学校）红总，都是造反派中持激进观点的，都曾在1967年的2、3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在本地“文革”中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成都军区机关内，有红纵、千钧棒这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重庆的五十四军（警备司令部，后为警备区司令部）机关内却没有这样的群众组织，只是出现过副营长黄富成等极少几个向部队领导造反的“乱军分子”。

在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方面，成都显然比重庆更强，因为成都多了一个省级机关和一个西南局机关。

造成重庆与成都两地“文革”情况有所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驻军的态度。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和成都军区一样，开始都支持了“保守派”，但是，五十四军从正式“支左”起就公开明确支持了重庆最早的造反派组织重大八一五，当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也始终支持了他们认定的“革命左派”八一五派。虽然他们在1967年2、3月“镇反”中也镇压了一部分造反派，但他们在“支左”中旗帜鲜明地支持的始终不是“保守派”而是造反派，从而能得到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任。成都军区则在1967年2、3月“镇反”中镇压部分造反派的同时公开扶持了产业军等“保守派”，因而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并被改组。改组后的成都军区站到了支持造反派的立场上，但在对待造反派两大派的态度上却又不像五十四军那样明确，总的态度（特别是被中央特地调入四川驻成都“支左”的五十军即成都警备区司令部）倾向于兵团、八二六派，但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却因与五十四军的亲密关系而倾向于红成派。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方面，重庆比成都显然规模更大，惨烈程度更高，这有历史形成的民风方面的原因，也有重庆已初步建成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而成都缺少这方面物质条件的原因。

在全面内战导致部分群众组织消极、分化后，重庆出现了以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成都也出现了以红卫军团为代表的“第三势力”。

对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和组员张西挺的态度，成为成都、重庆及四川其他地区两大派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因刘、张由毛泽东批准平反并就任要职后对两大派的亲疏态度不同，成都的红成派（是他们最先为刘、张翻案）和重庆的八一五派等一致从“炮轰刘、张”发展到“打倒刘、张”；而成都的兵团、八二六派与重庆的反到底派等，则认定刘、张是“红十条”上由毛主席批准担任省革筹成员的“好干部”，保刘、张就是保“红十条”，因而自称“红十条派”，而将红成、八一五等称为“反红十条派”。这个称呼，在“四二七”指示中遭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斥责。

#### ◇ “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

在武斗中走了“第三条道路”的重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在省、市革委会成立后，最早认识到群众组织使命的终结，率先成立了善后工作组，着手解散组织，遣返人员。

实际上，从毛泽东在1968年7月27日下令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驻清华大学，28日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时起，就已经宣告了“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文章不再号召广大群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继续“炮打司令部”，而是强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文章指出：“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必须批判‘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这里已经对“文革”群众组织的继续存在发出了警告。“斯莫尔尼大学是革命的司令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全会“一致通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全会公报称：“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公报还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

“文革”群众组织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就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1968年10月15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自即日起撤销各自的总部，包括——

#### 八一五派

重庆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包括重庆机关造反联合指挥部、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红卫兵重庆警备区；

反到底派

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  
重庆市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机关反到底司令部、  
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

同时宣布撤销的还有——

八一五派

重庆八一兵团总部、  
重庆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  
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二分团；

反到底派

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  
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一支队、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  
财贸井冈山总部。

群众组织的市一级各总部撤销后，一些基层组织也随之无形中解散了。余下的一些很快也在“归口大联合”中不复存在。

一些群众组织实际上早已停止组织活动，只靠极少数人办的小报、广播还勉强支撑着“门面”。但是这最后的一点“门面”也不再容许存在了。1969年11月17日（中央正式撤销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省革委会中的职务前夕），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刘结挺、张西挺、谢家祥、徐驰、何云峰、郑志士联名发出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全省所有的群众组织所办的小报、刊物和有线广播（站）一律撤销”。

重庆的“文革”群众组织，实际上在“文革”历史舞台上只活跃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但是，这段历史留给人们的思考却会是长久的。

说明：本文提到的群众组织及其代表人物的情况，部分来自历史报刊、传单等资料，部分来自对当事人的采访。因有的当事人已经故去（如八一五派的吴庆举、段德昌，反到底派的邓长春等），有的当事人联系不上或暂时不愿重提旧事，愿意谈的也存在记忆缺失等原因，资料严重不足，有的记载不一定准确、全面，望知情者多加指正。

（全文完）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转载（之八）

• 刘文忠 •

女工的血泪



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敲锣打鼓声，使我们这批蹲在“牛棚”里认罪自新的“牛鬼蛇神”心惊肉跳。老右派并打成“现反”的陈师傅悄悄咬耳朵告诉我：“‘文革’中敲锣打鼓是迎接灾难，‘文革’起始公布‘五一六’决议敲锣打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敲锣打鼓，公布‘十六条’敲锣打鼓……正似‘一片乌鸦乱叫’，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催命的锣鼓！”陈师傅毕竟是饱经沧桑的老工人，此话是从肺腑里自然流露的真言。我与辉哥的悲剧命运还不是在这阵阵敲锣打鼓声中开始的？！今天全厂热热闹闹，敲锣打鼓，不知又是为的啥？

在专政监督队员的押督下，我们“牛鬼”列队走进了工厂礼堂会场，才知开全厂大会，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我们被安排在会场前排低头站立听训话。当时广大红卫兵小将已被愚弄过了，年轻学生们越搞越乱，毛泽东眼看管不住他们了，就统统赶他们上山下乡去，而调动容易听话的工人群众来稳住局面。由此，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大文章发表，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学校、新闻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各科研单位都进驻了工宣队，工人阶级占领了上层建筑。而我们是工厂企业，且是不满二百人的集体性质小厂，怎么也要派“工宣队”呢？只听见工宣队团长在台上宣布说：“小小五金厂，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敌情复杂，已挖出的阶级敌人占全厂总人数10%以上，隐藏的敌人还不知有多少呢？……”下面他讲了什么，我已听不进去了，心头猛然觉得“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千钧分量又加重施压，头脑恍惚不可名状。在我们二百人不到的小厂内，现后关牛棚受监督的人已达20多个，再要“深挖”“清理阶级队理”，又要多少人遭难啊？岂不人心惶惶？工厂还能正常开工生产吗？

厂里“清队运动”进入了新高潮，挖出来的“牛鬼蛇神”除了监督劳动、蹲集体“牛棚”外，严重的被单独关押在某个角落，临时设置隔离措施，派专人日夜看管。一天我照例在日班工人下班后上楼去新产品车间打扫卫生，发觉车间一角临时钉起来用作隔离房关押的李大姐独自一人，没有看管人员，车间荡荡空寂，只有我“呼、呼、呼”扫帚扫地声。原来看管员去上卫生间又去食堂吃晚饭了。骤然间，我听到李大姐在隔离房小窗口叫声：“小刘，小刘，厂里、外面现在情况怎样？”对这位40多岁的女工，过去我同她并不熟，素无来往，印象不深。不料她倒了解我，说我平白无辜吃冤枉官司，告诉我进监牢后厂里不少人受牵连。当时，全厂为我的反革命一案折腾了很久。跟我比较好的人都被怀疑，为我吃苦头。如办公室小张，团支部书记，差一点也被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诬告我们两人值班时，他帮我一起印刷反革命传单。我的二位厂领导更为我吃了大苦头，说是他们重用了反革命分子，把全厂生产统计工作，交给了一个隐藏很久的反革命分子，竟还要叫他兼任宣传工作；又有“革命群众”揭发二位领导在多种场合公开与暗中表扬夸奖我：“刘文忠是个上进正派的青年”、“有工作能力，有教养，是个好小囡”……。许多人还揭发我“是个两面派，是个伪装了很久埋藏在厂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李大姐却暗地里常替我担心，不料她自己也落到如此地步。由于我每天傍晚上楼打扫，总是可以单独见到她，逐渐也对她的悲剧身世有所了解。

李大姐是厂里的老女工。她有一个兄弟在青岛某单位工作。1968年底“清队运动”中经不起批斗折磨，在强大的“逼供信”压力下，先后“坦白交代”，实际胡编乱造。说他自己39年参加过国民党救国军，曾任上海联络员，发展了姐姐（李大姐）、姐夫、爷叔多人加入。外调人员一到上海，马上殃及这三位亲属，分别被单位隔离审查。李大姐被日夜批斗，我曾陪斗过几次。我听造反派专案组审问她：“你参加了国民党救国军后，出卖、屠杀了多少共产党烈士？”从未参加过此类组织的李大姐怎么回答得出呢？她本人也从未知道所谓“救国军”的名称。造反派就说她“顽固不化，死路一条！”动手揪她头发，用脚踢她。一个老实本分的女工，禁得住这般人格凌辱吗？李大姐每次批斗每次血泪洗脸，痛苦不堪。我心里想39年，国民党抗战时有过“救国军”编制，那是组织一批热血青年投入抗日战争；解放前夕49年，国民党内也有“青年救国军”，那才是对付共产党的反动组织。造反派审查批斗时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毫无历史知识，把两者混为一谈，大力“逼供信”，无限“上纲上线”，竟认定李大姐是罪恶不赦的历

史反革命分子。李大姐有口难辩，冤沉海底，日夜在隔离房内饮泣不止。她的丈夫也同时被单位造反派隔离审查，家中留着年逾花甲的老母亲和四个子女。最大儿子17岁，忍受不了双亲突然被囚禁，自己成为反革命子弟的严酷迫害，愤然离家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当李大姐在隔离室看到女儿写给她的信，告诉大哥抛弃家庭和弟妹，痛恨父母反动历史而离开上海的消息，她突然瘫坐在地，痛哭了一整天。那天上楼进车间扫地，听她一声声呼天抢地的痛哭，让人心碎寒颤。看守人还不断凶斥她。一个多年为工厂为国家辛勤劳动的女工，一个上有老母，下有四个子女的母亲，被“莫须有”罪名剥夺了人身自由，精神上又遭凌辱不堪，丈夫也被隔离审查，大儿子在这遭难关口不了解父母冤苦而离家出走，正像一把把利剑直刺她心头。她失去了精神寄托，惟有无法挽救的绝望，她的身体与心灵全线崩溃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女儿又来信告诉她，自从父母被关后外婆很快病倒，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被迫挑起了家中重担，“病、贫、愁”三合一向她袭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亲戚家不敢去求助，怕牵连。她与两个幼小弟妹都成了反革命狗崽子，受尽邻居世人白眼，……。李大姐读着女儿这封洒满伤心泪的信，自己眼泪如珠，流淌在隔离室水泥地上。她唯一可以说话的人就是我，等待傍晚上楼打扫时，边泣边诉地向我哀告了自己目前的绝望惨景，她一再喃喃地说：“活着难做人，死了不甘心啊！”

一天晚上七点多，我下班走出厂大门，李大姐的大女儿赶紧上前来问我，她母亲这几天情况怎样？这位十五岁的小姑娘，失去了父母照顾与大哥持助，要服侍病重的外婆，要扶养年幼的弟妹，实在可怜巴巴的。她常来厂门口，求原来相识的厂内叔叔阿姨打听母亲消息，为关押的母亲送生活用品来，询问什么时候母亲可回家？在这个年头人们大多是明哲保身，对她这位“反革命子女”躲避还来不及，谁敢搭话递物呢？她知道我与她母亲一样是“牛鬼”，又肯热心帮忙，我曾帮她传递了几次日用品，又将她母亲的话转告她。这次她哭着说：“妈妈已关了八个月了。外婆病越来越重，又没有钱看病。弟弟妹妹天天吵着要见妈妈，不知妈妈什么时候能回家？家中一点钱也没有了，每月厂里领回去的一点工资半个月就花完了，可否向厂工会申请补助些钱？”我面对这个眼泪汪汪，孤苦求助的小姑娘，真不忍心告诉她母亲三日两日被揪斗，以及在隔离室中的悲惨景象。我只对她说，向工会申请该找谁，怎么样写申请报告。我知道她家中困难得揭不开锅，但她还问我妈妈缺什么。我自己也给这个懂事的乖孩子感动得要落伤心泪。后来有次傍晚在厂门口又遇见她，在她苦苦追问下，我忍不住把她母亲的话转告她：“你妈妈说，父母是冤枉的，你与弟妹要相信这一点。万一父母不在了，你们兄妹几个要好好活下去，照顾好外婆，生活困难就变卖家中一切值钱的东西，尽量少找亲戚，会牵连别人的。”女孩子听我说后哭得成了泪人，她吞吞吐吐说：“叔叔，我外婆快不行了！家里实在没有钱给她看病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被她的哭诉伤感得内心发抖，随手将刚发的月工资18元分了一半给她。她缩着手不敢拿。我告诉她，叔叔有钱。其实当时我也是个穷光蛋。记得这天是星期六，晚上上楼扫地时，我忍不住告诉李大姐，她女儿又过来了，问你需要什么东西？李大姐见我口气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急着追问家里出了什么事？我只得告诉她，听说你母亲病重了。李大姐“哇”地一声大哭出来。哭了片刻，她犹豫地拿出写好的一封信，沉重地托付我一定要交到她女儿手里。我郑重点头答应。

第二天是星期日，“牛鬼”是没有休息天的，我像往常一样，早上到厂里打扫卫生、监督劳动。大约八点，换班看守人员惊慌地从二楼奔下来叫喊：“不好了，不好了，李……李上吊了！”门卫与值班一边打电话，一边叫我去帮忙。我飞快奔上楼，踏进空荡荡的新产品车间，冲进已开着门的角落隔离室，只见李大姐直挺挺地悬吊在横梁上，双眼突出，瞪得大大的。我慌忙把她解结放下来，已经断气多时了！真是“死不瞑目”啊！很快，公安人员和厂革会头头都来了，验尸后，直接被送去龙华火葬场。厂头头通知她女儿来厂取遗物，我想起口袋里还藏着李大姐托付我转交的一封信，忍不住拆开一看，心里顿时伤痛得紧缩起来，原来是一封遗书！我真后悔，怎么没有觉察到她要走绝路，否则也许能救她一命，现在一切都迟了。

李大姐的遗书上这样写道：“孩子，从今天起你们将失去妈妈，妈对不起你们，是谁剥夺了你们的一切，不是父母，而是文革。如果妈妈能够找到有一条更好的路，决不会抛下你们离去，妈舍不得你们！现在妈妈必须永远离开你们，你们与一个死了的反革命妈妈划清界线不是容易一些吗？告诉你哥哥，不要怨我们，父母冤枉，妈死得不瞑目啊！你们不要哭我，哭一个这样的妈妈在今天是有罪的。你们要把眼泪流进肚里，把父母记在心里，他们真的是冤枉的。告诉你爸，我不等他了，先走了。可怜的孩子，妈无奈啊！心痛啊！老天对我不公啊！……”我读着李大姐的遗书，感到自己手里拿着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块滚烫滚烫的铁片。人啊人，这是什么人间世道啊！多少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啊？父母被关押批斗，孩子孤苦伶仃，在苦难的海洋里挣扎。李大姐这位老女工带着血泪冤恨，是升天堂，还是进炼狱？反正她永远逃离了这座人间地狱。李大姐肯定认为，死是她的解脱，只有以死来表明自己被冤枉了，与其孩子一起跟着她背黑锅，还不如让他们当孤儿，也许日子好过些。我情不自禁想起了裴多菲的名句：“大地你吃了什么？为什么这样渴？要喝那么多眼泪与鲜血？”中午，李大姐女儿来厂哭得断肠绝声，取母亲遗物，我掩住泪，悄悄塞给她这张滚烫铁片似的遗书。我望着这位悲痛绝望的小姑娘，心想可诅咒的“文革”又逼死了一位可怜的母亲，毁灭着一户善良的家庭。

### 沉冤母亲河

黄浦江是上海地区的母亲河。自从公元前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春申君黄歇倡导开凿，又名春申江，滔滔流淌二千多年来，她孕育了千千万万上海地区的儿女生存发展，也吸收、溶流着他们千年万代，祖祖辈辈的泪与血。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上海多少人士与全国民众一样在呻吟、涕泣，母亲河黄浦江同样在汨汨鸣怨，日夜愤流。她敞开了无私博大的胸怀，让无数含怨儿女投入而解脱劫难。正如有人所说“浦江不应满，你我血泪流。”我们小厂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电工裴师傅，就是这样沉冤黄浦江的。

老裴师傅解放前在码头当过搬运工，因手脚勤快，为人爽气，做了个小工头。旧社会，生活在码头、脚夫等底层行业里，为求糊口养家，参加民间帮会、拜老先生，那是难免而司空见惯的平常事。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裴师傅积极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自学了电工手艺，当过一家厂的小干部，后调来我厂仍做电工。他生来嗜酒好饮，几杯黄汤下肚，闲话特别多。他快人快语，向自己的徒弟吹了解放前这段个人身世。谁知经受了阶级斗争思想深刻教育的徒弟牢记在心。“文革”一来，形势大乱，“亲不亲，路线分”，什么师徒之谊、朋友之情、家属之恩，都没有了。这个耶稣的徒弟犹大，参加了造反队，小人得志，先拿自己师傅开刀，以求献忠心、立大功。他写大字报检举揭发裴师傅在旧社会是青红帮的大流氓、反动工头。于是栽在徒弟手里的老裴师傅被审查、批斗，牛棚、隔离。他平时脾气耿直，做电工时难免忙碌中顾此失彼，或受别人计较几句会火冒发牢骚，长年累月总有得罪人处。那些对他有成见的人纷纷加入了整他的队伍。他们用红油漆在他电工背心上写“牛鬼流氓裴XX”。并责令他，每天下班回家路上敲着簸箕，在专政队员监视下，步行一站路，一边敲打一边叫“我是牛鬼流氓”。老裴师傅在牛棚里告诉我：“我干了什么作孽的事，要这样惩罚我？甘愿抓进去坐牢，也不愿受这活罪！”他又说：“小兄弟，你知道，我敲打着回家，看到孙子满脸泪水躲在路边瞧我，真想地下挖个洞钻下去！作孽啊，我的老脸往哪放去？不如死了好。”没有几天，裴师傅再也受不了这般非人的凌辱，独自夜里悄悄跳了黄浦江。据说水上公安捞上他的尸体，在他口袋里没有找到遗书，仅找到一份“公安十六条”即“要文斗不要武斗”。裴师傅投入了养育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母亲河，是去诉说个人的冤愤，还是寻求心灵的解脱呢？

在“文革”暴虐高潮时，滔滔流淌的黄浦江成了暴政残忍的大自然见证人，几乎每天黎明可见浮江的尸体。我家邻居、儿时同学的父亲金龙山，他原是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主任。这是一个上千人的大车间，在他领导下生产月月超额完成，年年被工厂领导表扬。可惜他解放前是

船厂的一个码头工头，也参加过当时许多穷苦哥儿们讲义气结拜子的帮会。国民党统治者逃离上海时，想破坏工厂、炸毁船坞，是他带领一伙不怕死的义气铁哥们，日夜守护保牢了船厂船坞。解放后，军管会给他记载立大功，当劳模，提拔为干部。他八个子女又参军又入党。“文革”一来，他顷刻成了“工贼”、“大流氓”，成了无休止的审查、批斗、隔离对象。最后逼得他走投无路，跳进黄浦江自杀。昔日靠父亲沾过光的子女们，一下子变成了“黑六类子女”、“畏罪自杀者的亲属”，后来又减轻些说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母亲河挟卷着冤沉的无数灵魂，依然日日夜夜不停地奔流，冲出吴淞口，溶归了茫茫大海中。

正是“高天滚滚寒流急”，无法无天的“文革”寒流滚滚，使人世间的一切亲情、人情都冰封冻结，留下的惟有冷酷无情。我厂的一位老工人邵师傅，饱经沧桑的身世阅历，使他早就秃发谢顶，平时还能过得去的平民家庭中，被“文革”狂飙撕裂得支离破碎。他在厂里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运动的飞来横祸，不料小儿子为了争取当“红卫兵”，竟“阶级觉悟”高涨，大义灭亲，反戈一击，向学校的工宣队揭发他老子邵师傅所谓“反动历史”。老邵师傅忍无可忍之下服毒自尽了。老邵的老婆承受不了这一突然严重刺激，病瘫在床上，全家兄弟姐妹狠透了这个出卖父亲的孽子，赶他出了门。这孽子以出卖父亲的代价，最后还是没有参加成红卫兵，他醒悟太迟了。插队临走时跪在母亲面前求饶，母亲含泪说：“出身之父，养育之恩，你没有报答他，反而坑害他，你是孽种。我娘可以认你，但哥哥姐姐这辈子不会原谅你，走吧。”结果几年以后他自杀在农场。老邵虽然没有跳入黄浦江，但冤魂飘荡，无不随江入海，回归了大自然。

眼看着李大姐上吊、老裴电工投江、老邵师傅服毒，造反派们却在天天叫喊“畏罪自杀，死了活该！”而仍在蹲牛棚、关隔离、受监督的二十多名“牛鬼们”，依然被他们残酷镇压得死去活来，几乎仅仅留着一口气，大家私下悄悄地都说：“还不如投入黄浦江死了，一了百了。”

厂里“牛鬼队”中有一位梁大姐，山东人，有文化，说一口普通话。“文革清队”查出她抗战期间与丈夫在山西读书时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于是项目组几个没有文化没有历史常识的人批斗她，问她参加国民党干了多少反共的事。她大呼冤枉说：“当时有许多青年学生在山西太原参加国民党是为了抗日，那时的国民党是抗日的。”项目人员训斥她“放毒”，说国民党从来没抗过日。梁大姐争辩，当时国民党汪精卫一派是投降日本的，在南京当汪伪汉奸，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退到武汉，后到重庆，是抗日的。批斗人员硬说她“美化蒋介石”，加大了战斗火力，逼令她读毛选《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项目组长还振振有辞地说：“蒋介石是投降派，从来没有领导过中国人民抗过日本。当时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直到胜利，是林副统帅打下了辉煌的扭转整个抗日局面的平型关大战！”梁大姐有口难辩，只有说“参加国民党不等于反共，那时八路军就是国民党的编制，共产党里毛泽东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都参加过国民党。”这一辩可不得了，造反派立即冲上去把她打倒在地再踩了一脚，高呼口号：“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不倒！”我在旁边陪斗，正想开口证明梁大姐说的是历史事实，但想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在此还有说话的权利吗？说了反而会连累梁大姐遭更大毒手，只得心内自忖：只怪教育当局不尊重历史事实，在解放后所有中小学教科书中，不敢实事求是写出国共第二次合作，就是共同抗日，当时中国统一的抗日领袖，连毛泽东都说是“蒋委员长”，抗日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与苏联斯大林一起，参加了国际上召开的中、苏、美、英、法胜利国际会议，并发表了“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可怜无知的造反派好汉们却对中国现代史一无所知，硬说凡是参加国民党的是反共的，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梁大姐为此遭受肉体、精神上的无比摧残，日夜以泪洗脸，几乎被逼上绝路。

厂里还有位姓陶的老工人，原是五金行业的一个工商业主，公私合营并进了街道工厂，后变成本厂工人。清查队查出他是个“地主”。他叫苦连天，说自己从10岁起跟与父亲分离的母亲在上海长大。父亲死后早就把乡下田产分给了异母的几个长兄，他一分地一间旧屋也没有分到，乡下的土地在土改后早归合作社、生产队。他本人来上海后从未去过乡下，根本没有收过

当地农民一升粮，这“地主”帽子怎么戴得上？造反派说他“狡辩”，并训斥他：“老地主生出的儿子，身上自然流着地主分子的血液，血统上一脉相传。你虽然没有去过农村，就算‘工商地主分子’！”陶师傅万般冤屈辩不明，造反派一言既出便为“法”，再不识相拳头巴掌一齐来教训他。这样暗无天日的苦难叫年老的陶师傅怎样活下去？

另一位朱大妈老工人，年近60岁，平时性格开朗，加上长相生来端庄，所以不见苍老。造反派却妒忌她“老当益壮”，硬是把她打成“双料反动婆娘”，即是“地主婆”又是“资本家老婆”。其实，朱大妈自小也是苦命人，16岁父母做主嫁给乡下老地主做妾，土改时老地主去世，她穷人家出生，身无分文逃难到上海做保姆，后来嫁给了一个小资本家。于是她得了这个双重反动身份。实际上再嫁的丈夫肺病死后，她家境败落，只留下几台破旧的冲床机器，她巴不得公私合营上交，自身进街道工厂混口饭吃。寡妇孤女拖带四个子女，长期操劳重担，任劳任怨度日。不料“文革”没有放过她，抄家批斗，从里弄到工厂，她被戴了二顶反动帽子。有次在里弄批斗她时，她的女儿为了划清界线，冲上去打了她二记耳光。朱妈妈确实想不到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会如此绝情冷酷，使她人格上，精神上再也受不了，从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好端端的朱大妈变成了痴呆，一下子白发披散，双目滞碍，经常胡言乱语，真像个尚有一口气的活死人。

“牛鬼队”里悲惨的景象触目皆是，诉不胜诉。旧社会里人变成了“鬼”，后来解放后把“鬼”变成了人，出现了著名《白毛女》传奇故事。谁能料想到，在全国大陆解放十七年后的“文革”风暴中，千千万万的人又被变成了“鬼”。正不知地狱有无国界之分？假如地狱里有一方标在中国名下的空间，那里一定会水泄不通地挤满冤死的灵魂？领袖拿贱民的血来祭“文化大革命”大纛。“文革”像张开了血盆大口的巨禽怪兽，一口又一口吞噬着一条条生命，而将幸存苟残的“牛鬼”们万般折磨肆虐得魂不附体，心灵早已恍恍惚惚，犹如随着母亲河黄浦江飘飘荡荡，沉冤到茫茫无际的汪洋大海，不知何处是岸呵？！

~~~~~

【资料汇编】

文革中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

• 欧阳龙门 •

本文概要描述文革前夕在任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整肃的统计结果。本文“附录”列出了文革前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除去北京的彭真、内蒙古的乌兰夫、宁夏的杨静仁、广西的韦国清等四人的兼职重复，共有党政负责人54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革命开始以后，这些人几乎全数受到冲击，被群众组织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遭到批判、斗争。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批准在报刊上点名批判中央和地方55名“走资派”，其中21人是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彭真、万晓塘、林铁、卫恒、王谦、乌兰夫、李范五、陈丕显、曹获秋、李葆华、叶飞、方志纯、文敏生、王任重、赵紫阳、廖志高、贾启允、阎红彦、汪锋、杨静仁、王昭。

在这些人当中，云南的阎红彦、山西的卫恒于1967年1月自杀，青海的王昭于1970年2月在监狱中去世，上海的曹获秋于1976年去世（一说自杀）。

1968年1月至7月，中央在批准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文件中，除了重申以上负责人是走资派以外，还增加了以下几人：江渭清、黄岩、李启明。

因此，可以认为中共官方正式认可的“走资派”一共是24人，占44%（见《文革中的走资派》，载《华夏文摘》zk0501e）。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也就是实现了当时所说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文革前的文革中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有14人以“革命干部”身份进入革命委员会，他们是：

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  
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广东省省长陈郁，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  
贵州省省长李立，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  
云南省省长周兴，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赛福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这些人都进入了九届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还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成为候补中央委员。这部分共15人（占28%）。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被打倒的“走资派”当中，党委负责人居多，25人中有17人（68%）；而在进入革委会的“革命干部”当中，政府负责人居多，14人中有8人（57%）。

附录：文革前夕的29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  
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 市长：胡昭衡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 省长：刘子厚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 省长：王谦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府主席：乌兰夫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 省长：黄欧东  
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 省长：栗又文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省长：李范五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市长：曹荻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省长：惠浴宇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 省长：周建人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      省长：黄岩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省长：魏金水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      省长：方志纯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      省长：白如冰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省长：文敏生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省长：张体学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省长：程潜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      省长：陈郁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府主席：韦国清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      省长：李大章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      省长：李立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省长：周兴  
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      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      省长：李启明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省长：邓宝珊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府主席：杨静仁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      省长：王昭  
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      政府主席：赛福鼎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